

**The Cosmopolitan Imaginary of Global City-Regions:
Articulating New Cultural Identities in Taipei and Shanghai**

—Tsung-yi Michelle Huang

**全球都會區域的彈性身分想像：
以台北與上海為例**

黃宗儀

誌謝：作者感謝台大外文系李紀畲、中研院社會所汪宏倫以及《文化研究》匿名審查人與編委會委員提供的諸多寶貴意見與指正。同時感謝台師大英語系黃筱茵、張依瑾潤稿，台大地理系王資惠、張育源校稿。另，《文化研究》編輯陳惠敏、劉允華細心校對排版在此一併致謝。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94-2411-H-002-107-B1部分研究成果。

黃宗儀，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電子信箱：zongyihuang@ntu.edu.tw

摘要

全球化時代的都會連結不僅是產生各類跨國身分的社會現實，也成為形塑與言說這些新身分的論述框架。本文聚焦微觀的文化文本（王文華與陳彬之作品），參照宏觀的文化身分論述（「新上海人」與「同文同種」）來探討台北與上海全球都會區域跨國主體彈性身分的再現政治。藉由分析王文華暢銷上海的《蛋白質女孩》系列，我試圖說明小說如何將彈性身分情慾化與戀物化。王文華將專業經理階級再現為全球都會區域合法尊榮的使用者以及時尚生活方式的楷模，《蛋白質女孩》因而成為「新上海人」跨國菁英身分的文化代言。另一方面，分析台商陳彬《我的上海經驗》系列中台商的再現與各種自我表述的身分標籤，本文試圖釐清「新上海人」與「同文同種」之說預設的彈性身分所隱含的意識型態，並進一步說明跨國主體彈性身分內在的階級與性別矛盾，以及資本彈性積累與王愛華所謂「彈性公民權」之間可能的衝突對立。

關鍵詞：全球都會區域、跨國主體、彈性身分、台北與上海連結、都會居住論述、離散華人

Abstract

Given the broad consensus among academic geographers that a new matrix of global city-regions is on the ris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how how urban linkage has become not only a social reality that produces various cosmopolitan identities but a discursive framework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articulation of these identities so as to reproduce the urban networks.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imaginary of flexible identities” and its problems, I will analyze several representative cultural texts including Wang Wen-hua’s bestsellers in Shanghai, *The Protein Girl*, its sequel *The Protein Girl II*, and Chen-pin’s bestsellers in Taipei, a series of non-fiction works on how to survive and succeed in Shanghai. Situating these tex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Taipei-Shanghai linkage, I will critique the imagination of the flexible identities, enabled by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of global urban networks, and further lay bare not just the intricat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new geopolitical regionalism and cultural narrative of Chinese transmigrants but the intens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flexibl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flexible citizenship” in Aihwa Ong’s terms.

Keywords: global city-regions, transnational subjects, flexible identities, Taipei-Shanghai link, everyday urbanism, Chinese transmigrants

要知道，身分是個被激烈拉扯的概念，每當聽到這個字，便知這當中正有一場戰爭在進行，戰場即身分天生的歸宿。身分只在戰亂中甦醒，當戰亂止息，它就沉入夢鄉。

——包曼(Zygmunt Bauman)

文化身分本身即是一個流動的概念。文化身分不只是歸屬感，同時涉及策略性地運用文化資源、文本與訊息來建構可攜式的各種身分。

——欽恩(Michael Keane)

一、全球都會區域與彈性身分

1980年代以來以「世界都市」(world city hypothesis)為軸心概念發展的都市地理研究近年出現一個新趨勢，即是學者紛紛指出區域(region)或者連結(linkage)的定義較能含括不同型態的全球都市空間並且闡述這些節點(nodes)彼此之間的動態關連。因此，新興研究多強調理解都會群連結地理重整的重要性而非僅以倫敦、紐約或東京這幾個全球城市為論述核心。¹換言之，諸多地理學者認為要瞭解當代全球化地理必須從「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切入，分析都會之間的連結(inter-urban linkage)而非僅著眼於一級全球城市的功能或特性。²新

1 1980年代初期科恩(Robin B. Cohen)以及傅瑞門(John Friedmann)等學者提出「世界都市」的概念。此類研究以一級(first tier)世界都市（如倫敦）為中心，強調其作為資本運籌帷幄節點之功能，後來學者包括金恩(Anthony D. King)與薩森(Saskia Sassen)的研究皆有其代表性。

2 史考特(Allen J. Scott)將全球都會區域稱之為「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2001: 1)。霍爾(Sir Peter Hall)認為全球都會區域代表全球城市(global city)發展的新階段，是都市組織的新尺度(a new scale of urban organization)(2001: 57)。傅瑞門也說都會區域可謂都市景觀的新形式(city-region as a new form of urban landscape)(2001: 123)。史考特所定義的全球都會區域大致可分為三種形式：其一是較接近全球城市概念的大

區域主義的主要型態諸如全球都會區域(global city-regions)、鏈鍵城市(linked cities)的相關論述於是成為近年都市地理學方興未艾的研究課題。³

從地理學對全球都會區域的討論出發，本文試圖以東亞的台北與上海為例，說明資本彈性積累(flexibl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帶來的人員流動與國際分工如何生產新的跨國主體與身分想像。借用王愛華(Aihwa Ong)的「彈性公民權」(flexible citizenship)與哈維(David Harvey)對彈性積累的定義，我將以「彈性身分」(flexible identities)一詞來分析全球化都會連結衍生的跨國主體想像。

首先，王愛華的「彈性公民權」是理解今日全球化跨國主體的新身分及其需求(claims)的關鍵詞。根據對華人跨國經理階級的研究，王愛華自創「彈性公民權」來指涉：

促使主體以投機且流動的方式因應不斷變動的政經形勢的文化邏輯，包括資本積累、旅行或錯置等等。在這場追求資本積累和社會威望的全球競爭中，主體追求但同時受制於種種容許他們以彈性、流動以及重新定位來因應市場、政府與文化制度的實踐。(1999: 6)

對王愛華而言，國際勞動分工造成的彈性公民權應被理解為協商的結果，而非在無疆界世界所運作的空間實踐：「儘管跨國經理人與專業人才精於經濟積累、定位與操縱的種種策略，但他們並非在自由變動的情境中運作，而是時時身受國家與市場的控制」(1999: 112)。

「彈性公民權」的論述有助於釐清今日跨國經理人的身分協商。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我們是否能從更深廣的方向，亦即，全球化的

都會區，包括核心城市與其大小不等的腹地；其二是組合或集合城市(conurbations)，如南加州或從華盛頓特區到波士頓的城市樞紐帶；其三是以合作形式連結的城市，這類都會區域有時跨越國界，例如美國的聖地牙哥與墨西哥的提璜那(Tijuana)，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柔佛(Johor)與印尼的巴淡島(Batam)(2001: 4)。

- 3 「全球都會區域」概念可參見史考特編著《全球都會區域：趨勢、理論與政策》(*Global City-Regions: Trends, Theory, Policy*)。「鏈鍵城市」參見薩森的《全球網絡·鏈鍵城市》(*Global Networks, Linked Cities*)。

彈性積累來理解都會區域連結情境下「彈性公民權」的意義？在此，哈維對彈性累積的說明可補充延伸王愛華之彈性公民權。哈維指出，有別於福特主義(Fordism)，彈性積累：

仰賴在勞動過程、勞力市場、產品和消費模式等方面的彈性因應。其特色為發展全新的生產區位，提供新的金融服務方式、新市場，及更重要的，在商業、科技和組織各方面創新的日新月異。(1990: 147)

他認為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彈性積累產生了「新一波的時空壓縮」(a new round of time-space compression)：「……私人與公共決策所用的時間範圍已然大幅縮減，衛星通訊和日漸降低的運輸成本使得這些決策愈來愈能即時傳送到更廣闊、更繁雜型態的空間中」(1990: 147)。

換言之，今日資本主義的彈性積累跨越多重尺度，既改變了生產、勞動與市場，也產生新的國際分工形式。我認為由此應運而生的身分想像可稱之為「彈性身分」，用來指涉「專業經理階級」(the professional managerial class)為主的跨國主體。王愛華的「彈性公民權」即是眾多彈性身分之一，其他常見的例子包括「全球菁英」(the global elite)、「空中飛人」(astronauts)、「世界都市人」(cosmopolitan urbanites)、「世界公民」(citizens of the world)等。

本文將以微觀的文化文本為主，參照宏觀的身分論述來探討跨國主體彈性身分的再現政治。首先，藉由分析王文華在上海暢銷的小說《蛋白質女孩》系列，我試圖說明彈性身分如何被再現為情慾化與戀物化的生活風格，使上海讀者得以輕易認同小說人物，進而將書中「跨國主體即是全球菁英」的意象轉化為「全球菁英即是新上海人」。接著，我將聚焦台商陳彬《我的上海經驗》系列中台商的再現與各種自我表述的身分，來對照「新上海人」與「同文同種」的論述。透過彰顯不同敘事的彈性身分所隱含的意識型態，進一步釐清資本彈性積累與彈性公民權之間可能的矛盾對立。⁴

4 必須釐清的是，本文分析的台商概念並非以國家為公民權的場域或機制。雖然台商的身分形成與兩岸國家想像和政治關係有錯綜複雜的關係，但

二、台北—上海鏈鍵與東亞全球都會區域

要了解當代台北與上海連結衍生的彈性身分的脈絡，首先必須理解全球都會區域的地理尺度如何被轉譯成各種文化形式。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只將上海和台北視為兩個東亞城市而不是一個全球都會區域，便隱匿忽視了東亞區域主義重要的社會經濟脈絡。在這樣的前提下，探索東亞都會區域的歷史發展有助於釐清現今全球化產生的台北—上海鏈鍵。在過去20年間，東亞國家的發展與柯司特(Manuel Castells)所描述的社會趨勢若合符節：「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取代了「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s)(1993: 368)。仔細觀察，我們發現國家相互合作形成了經濟區域，並進一步達成全球鏈鍵下「流動空間」資本積累的目的。如金淳基(Samuel S. Kim)所言：「東亞區域化與區域主義的框架最明顯的即是經濟領域」(2004: 40)。楊汝萬(Yue-man Yeung)也認為，過去20年來，亞太地區展現經濟全球化的特性之一便是區域經濟日趨整合，不僅跨國公司與東亞各國合作(outer globalization)，跨國、跨區域的合作更是蓬勃發展。參與其中的經濟體各自提供不同資源合作，可說是區間跨國流動(inner globalization)的典型(2000: 12)。誠然，植基於東亞都會區域連結的區內貿易在全球化時代下日益重要。楊汝萬的研究指出：相較於1980年代的33%，區域內(intraregional)的貿易往來目前已佔有全區總額的43%。也就是說，「區域內的投資與資本流動是本區交易獲利成長最快速的」(2000: 17)。

急速發展的跨國網絡促成東亞全球都會區域的興起，其中有兩種主要的連結形式值得深究。⁵其一是「成長多邊合作鏈鍵」(growth

跨國主體文化身分的複雜不應局限於國族主義的框架。事實上，全球都會區域跨國主體的身分想像與城市的關連經常較其與國家之間的連結更為緊密。參見薩森(2002b)以及侯斯頓與阿帕度萊(Jonh Holston and Arjun Appadurai 1996)。針對(上海)台商的身分形成與國家和台灣主體性的關係，參見耿曙(2002)與汪宏倫(2005)的相關研究。

- 5 根據金淳基的研究，今日東亞最有影響力的區域組織應為東協加三(ASEAN+3)，由東南亞國家聯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triangle)，這是自1980年代以來發展的次區域性(sub-regional)經濟區域，⁶以南中國成長多邊合作鏈鍵（台灣、香港、廣東與福建）、JSR（馬來西亞、新加坡與印尼）以及黃海區域合作（中國、南韓與日本）為代表。⁷蕭新煌指出，1980年代末多國多邊合作的模式在亞太地區快速擴展。相較於前三波的發展，這一波以「成長多邊合作鏈鍵」形態發展出的區域合作「都立基於亞太內部跨國、跨區域的資本、技術、人力和市場的連結之上」（1997: 5）。此外，晚近亦有學者提出所謂「雙黃金三角」（矽谷、台北與上海以及東京、台北與上海）。⁸東亞區域內都市網絡合作的另一個重要形式是華人城市的串連。這樣的連結主要指兩岸四地（大中華，the Greater China），有時向南延伸至新加坡。近年來不少都市或文化論述常串連華人城市來包裝各種企業合資，例如上海與香港、上海與台北或上海與東京之「雙城記」⁹和台北、香港與上海或台北、香港與北京之「三城記」等。¹⁰

從兩個方面來說，台北和上海可視為東亞全球都會區域。一方面，它們同是在成長多邊合作鏈鍵中（東京、台北與上海，台北、香港與上海，或長三角、珠三角與台灣）擔任指揮支配的節點角色；再者，它們都屬於華人城市網絡（兩岸四地的城市）。¹¹

及中、日、南韓(NEA-3)組成。他認為「區域經濟的重心已由美國主導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移轉到東協加三」(2004: 13)。

- 6 “growth triangles” 一般譯為「成長三角」或「成長圈」，我將其譯為「成長多邊合作鏈鍵」以強調全球化區域連結的意義與功能。
- 7 黃海區域合作地區的中心即為中國渤海灣，因其環繞北京與天津兩自治市以及河北、遼寧及山東三省。
- 8 周逸衡和徐明宜(2001)建議以台北為中心，發展「雙黃金三角」以提升台灣競爭力。
- 9 關於現今香港上海雙城記的分析，請見阿巴斯(Ackbar Abbas 2000)以及拙作(2005)。
- 10 例如，兩岸三地的出版業和電影業於2001年展開合作計畫：其中之一由王安憶、王德威與許子東聯合編輯，推出《三城記》系列。之二是焦雄屏名為「三城記」的六部電影計畫：這個計畫分別聘請了台灣、香港及大陸的導演，拍攝台北、香港與北京三城近年都會變遷的故事。
- 11 東亞區域主義和國家主體性之分析，見王愛華(2004)。她認為「大中華」是國家機器繞道區域經濟合作來達成整合不同政治體的策略(70)。

對於西方學者如萊丁(Gordon Redding)和葛瑞(John Gray)而言，華人連結說明了自1970年代以來的東亞經濟奇蹟。他們認為華人資本主義精神奠基於儒家家庭倫理觀，強調關係而非個人主義(1990, 1998)。此種觀察固然指出華人連結對次東亞經濟連結的重要性，卻需要進一步的修正才能適用於今日的情境。舉例而言，由於現今全球資本主義仰賴都市節點與都會連結來達成彈性積累，要理解現今華人經濟網絡，必須強調全球都會區域之發展脈絡。換句話說，在東亞的華人全球都會區域中，都市間的合縱連橫是一個策略場域(strategic site)，讓我們得以耙梳全球都會區域與跨國主體身分之間的關係。其次，萊丁和葛瑞的解釋過分依賴所謂華人文化的統合性，卻忽略了在地差異。其實，全球化情境的華人城市各自有其複雜的在地特性，對於迎合全球資本主義的區域合作需求亦有不同的因應及協商方式。同時，不同歷史時期因區域地緣政治產生的變動也可能造成城市間的緊張關係。由此可見，聚焦華人城市間的種種糾結拉扯有助於深化對東亞華人城市網絡運作的理解。

三、台北流行文化與上海跨國主體彈性身分想像

在東亞全球化區域發展趨勢之下，因資本積累而連結的台北與上海，造成哪些新的文化流動與社會主體？我們如何進一步思考全球複雜網絡中台北與上海的跨文化交會以及跨國主體身分形成的意涵？就這一點來說，柯普蘭(Caren Kaplan)與馬潤潮(Laurence J. C. Ma)對跨國人員流動的討論深具啟發性。柯普蘭視旅行者為今日跨國流動主體的主要譬喻，強調我們需用新的視野來理解旅行和跨國主體：

旅行的概念為一個擴張的跨國性，它產生以不同方式連結的主體……旅行可視為一個各端點之間充滿張力的傅科式的場域，或者連結起點與多重端點行旅的延續(continuum)，而非僅是舊有的「這裡與那裡」的兩端／二元對立，這樣的理論可能衍生更多重的主體。(2002: 117)

地理學家馬潤潮亦強調今日全球遷移路徑的複雜多變：「今日

的空間互動是多方向的(multidirectional)，有多重的出發點與目的地」(2003: 19)。根據他的研究，自1980年以來，華人移民有再遷徙(remigration)的傾向，使華人區域之間人員互有流動。馬潤潮提出一個有趣的觀察：一如香港，台北成為當代離散華人的中心之一：

全球化與對中國統治的恐懼使得香港與台灣成為華人移民的重心，移出與移入人數皆相當可觀，中國大陸不再成為海外華人唯一的原鄉……華人移民的新路徑重繪跨國人員與資本流動的地圖，也造成移民的社會異質性。當代的華人移民不像1960年代，廣東人與福建人移到東南亞這般固定外移路線。(2003: 19)

藉由柯普蘭和馬潤潮對跨國人員流動的觀察來解讀近年來台灣人湧入上海的現象，我們可進一步推論，在兩岸都會區域連結的情境中，台北／台灣之於上海而言不僅代表輸出人力和資本的端點，同時也是全球都會區域華人特質文化符號與意象的生產操作中心之一。估計近年上海與周邊地區已有超過50萬的台商，台北的資本流向上海的同時，不僅使人員流向上海，也造成離散文化的再遷移，促成由台北將文化輸入上海的可能。換言之，從台北／台灣流入上海的資源和資本亦促使新的文化形式激增。王文華的小說與陳彬的上海實用守則便是兩個深具代表性的例子。¹²

12 由於流行文化不僅能表現文化流動，也常是最能彰顯都市居民感知經驗的修辭與想像的敘述空間，這類大眾文化因此可以用來翻譯或重思今日地理學對全球都會區域論述的理論。就文本的選取而言，本文因強調全球化情境下的台北上海連結，因此主要討論的再現以2000年之後出版的文化文本為主。

四、《蛋白質女孩》：全球都會區域彈性身分的文化翻譯與新上海人的情慾書寫

台灣作家王文華在上海的流行近年來已是有目共睹。¹³《蛋白質女孩》自2000年出版以來風行兩岸，吸引兩岸眾多讀者。¹⁴對於王文華在上海的高人氣，《遠見》雜誌主編成章瑜說：「如果說上海是巴金的都市、張愛玲的都市、白先勇的都市，現在還要加入是王文華的都市、幾米的都市」（2003b: 161）。有趣的是，何以台北的小說家與畫家成了當代走紅上海的說故事的人？¹⁵不少論者以為王文華（與幾米）的流行與上海小資興起息息相關。例如，《亞洲週刊》的總編輯邱立本便說，「王文華作品是兩岸小資讀者的最新共鳴」：

王文華作品在大陸流行，其實也顯示中國缺乏現代的都會小說，尤其過去十年來中國京滬穗深等大城市都會驚天動地的變化，都未能充分反映在中國文學作品上。小說題材跟不上時代的變化，就讓《蛋白質女孩》乘虛而入，走進一億多中國小資心中的秘密花園裡。（2003: 4）

誠然，台北與上海雙城的連結基礎之一即是普遍化的中產階級都

13 王德威指出：「憑著《蛋白質女孩》一、二集，王文華走紅台灣、大陸及海外，成了『人氣作家』。我們的領導人正高唱一邊一國，悲壯得緊，倒是兩岸讀者因為有了共同的『蛋白質』，反而心心相印起來。」見王德威，2002/9/13，〈蛋白質的修辭學〉，《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14 王文華官方網站(2004)如是說：

《蛋白質女孩》中文簡體版 2002 年 1 月下旬甫於中國大陸正式上市，僅一個月的時間，即創下 15 萬本的高銷售量，榮登上海地區的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除打敗《哈利波特》外，還超前於余秋雨、村上春樹等高知名度常青作家……王文華的《蛋白質女孩》自 2000 年 6 月上市後，即在台灣當地釀起一波為期頗長的討論、閱讀風潮，至今再版近 20 次，總銷量突破 15 萬冊，一年多來，發燒持續不退。許多廠商，也借用「蛋白質女孩」一詞，行銷手機服務到西洋歌手等各類產品。

15 幾米是台北著名的插畫家。「他的作品都是有關都市人的小故事。他在台北、東京、漢城、香港、上海和新加坡都相當受歡迎。」(Taipei Times 2003)。他的插畫集，包括《地下鐵》和《向左走，向右走》在香港和中國都曾翻拍成電影、電視系列和戲劇。

會空間與時尚品味的身分想像。¹⁶成章瑜也認為：「因為上海白領小資的興起，都會的愛情，都會的哀愁，讓王文華及幾米在上海書店，一躍成為暢銷作家」（2003b: 161）。然而，若過度聚焦小資興起這個顯而易見的因素，我們可能忽略當代上海與台北的文化連結有其特殊的時空背景。與其將王文華現象簡化為中產階級普遍化的價值觀，不如深化中產階級作為連結基礎的意義，將小說如何生產與再現跨國主體的身分置入全球都會區域的文化翻譯脈絡來思考。

我認為王文華作品能一夕走紅上海，是因為作者成功地翻譯西方因全球都會連結而衍生的理想都會菁英文化，迎合了全球化時代的上海人對彈性身分的想像。1980年代以後快速的資本全球化促使都會空間發展爭相加速曼哈頓化(Manhattanize)，益發迎合專業經理階級的需求，這些高流動性的彈性公民不僅常被規劃者視為城市最尊榮、最正當的使用者，他們以世界知名城市為家，空中飛人的時尚生活方式同時成為成功的象徵，是升斗小民向上提升的指標與夢想。¹⁷如霍爾(Stuart Hall)所言，新全球管理階級「擅長為他人展現都會風格與身分地位的各種新形式……身分地位是新富階級的文化指涉，是社會成功的具象化。他們也開始將其品味、主張與生活風格強加在全球城市上」（41）。1990年代之後的上海渴望以二十一世紀首要全球城市之姿躍升國際，如火如荼的「再全球化」運動(reglobalization)鼓勵上海人尋回1930年代的老上海風華，並藉此推動上海與世界接軌的大計。上海的全球化發展以紐約、倫敦等一級全球城市為楷模，都市大規模

16 2003年1月5日《中國時報》開卷版以〈2002華文市場大贏家幾米、王文華通吃兩岸〉為題分析中文書市，記者指出「預料，除非再有貼近中國大陸『小資』階級城市生活情調的強棒作家出現，否則幾米與王文華的作品應該不難維持基本穩定的銷量」（丁文玲 2003）。

17 根據薩森的研究：如紐約、倫敦和東京這些一級全球城市一個重要的特色便是兩種城市使用者大量擴張：其一是專業經理階級，其二是底層社會，包括新移民及低技術勞工。這兩種階級的並存展現了社會不平等和空間隔離——底層階級邊緣化到都會戰區，而特權階級輕易佔領都會華麗區。對專業經理階級而言，一個理想的城市要能滿足他們各種空間需求，例如良好的基礎建設（機場和高速公路），適宜談生意與下榻的豪華空間（五星級旅館和地標型辦公大樓），以及城市周邊可從事休閒娛樂的時髦地點（流行餐廳和酒吧）（1998: xxxiii）。

的改建打造了陸家嘴、上海新天地等都會華麗區，因資本流動匯集的專業人士也成為代表上海未來的新階級。這批都會菁英同時重塑了上海居民對集體新身分的想像，衍生各類彈性身分，表達對全球菁英的認同與嚮往，諸如「新富階級」、「中產」、「白領」、「成功人士」、「IF族」(international freeman)、「新上海人」等。¹⁸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新上海人」身分論述。「新上海人」說法有幾個重要特色。首先，論述的核心是世界主義的開放好客心態。也就是說，「新上海人」意指今日新上海眾多非土生土長、因各種原因移居在此的居民的集體名稱。有趣的是：這個世界主義論述一再援引老上海文化，強調自十九世紀末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上海開埠以來便有多種文化接觸，因此上海有海納百川、寬容大度的文化特質。¹⁹更重要的是，租界時期的半殖民情境被視為當代全球城市的雛形。在這種論述架構下，新上海傳承了老上海文化，體現海納百川的世界主義，吸納含括各種外來文化與人口。²⁰《新上海人》一書的〈前言〉便說：

對於「新上海人」，大家一致同意，如上海本身一樣，是生生不息的；新上海人變成老上海人，老上海不斷吸納來自全國各地不同背景的新移民和上海本地區居民，為城市帶來源源不絕的新觀念和新知識，又派生了新上海人。
(2003: 1)

兼容並包的世界主義文化正是「新上海人」論述的核心價值，也一再被視為串連上海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想像底蘊。細究來說，新上海人

18 所謂「IF族」是上海流行術語，亦即一群可以在全球自由選擇工作、居住與生活的人，是一群都市冒險階層對幸福的想像（成章瑜 2003a: 108）。石磊提到有錢人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集體名稱：「萬元戶、暴發戶、大戶、大款、富豪、富婆、富姐、新貴、老闆等。」「上海的新富階級現名叫中產，暴發之後開始追求品味，但骨子裡仍然是大款的鄙俗。」（2004: 40）關於成功人士的論述參見拙著（2004）〈都市空間的生產：全球化的上海〉與王曉明（2000）主編之《在新意識型態的籠罩下：90年代的文化 and 文學分析》第一輯〈誰是成功人士？〉。

19 參見熊月之與周武（2003）主編之《海納百川：上海城市精神研究》，第二章〈海納百川〉，頁41-82。

20 關於上海的租界時期與世界主義，參見阿巴斯（2000）。

是一個意象，是因應全球都會區域的新階級產生的象徵符號系統，主要用來指涉專業菁英。港、澳和世界其他地區來的華人菁英皆為新上海人。上海前領導黃菊便說新上海人是「世界人、中華人」（引自熊月之，上海證大研究所主編，2003：120）。楊國榮也說，「新上海人不僅是『上海人』，而且應當是世界公民」（上海證大研究所主編，2003：127）。²¹這幾個身分的並置顯示了一個企圖：吸納世界各地華人菁英，使其認同新上海人這個身分，並稱上海為「家城」（home city）。²²如哈維所言，全球化時空壓縮情境下的重要面向之一即是建構意象與符號系統：為求快速累積資本，生產組織與技術、消費形式日新月異，因應如此變動的再現系統於焉產生。而意象的另一功能則是在變動不羈的市場上建構某種身分，以「積極介入變動性的生產」，重塑市場的變動性以達成個人目的(1990: 287)。新上海人意象的菁英形象便是操縱文化身分以介入變動的全球市場，其具體的功能是讓全球資本主義得以透過如此的身分想像連結資本中心（上海）和多元地方（multiple local points，港、澳、台及其他）。

王文華小說再現的全球菁英與新上海人的階級預設不謀而合，滿足了上海人對加入全球俱樂部之後追求新身分的渴望。首先，王文華的獨門絕活之一便是能創造中文的時尚語言來描述全球城市菁英與品味。王德威(2002)一針見血地說，深究《蛋白質女孩》慾望城市的愛情書寫，其實與中國「才子佳人文體」有異曲同工之處：「《蛋白質》的賣點之一，是王文華能將他所觀察的都市現狀、男女心情連鎖起來，以韻文表達。對習慣文字平鋪直述的讀者，這毋寧是種驚

21 黃菊說新上海人是「世界人、中華人。上海就要有容納世界最優秀人才的海量，同時又該成為人才自如來去的一湖活水」（引自熊月之，上海證大研究所主編，2003：120）。徐匡迪主張上海「要以海納百川的寬廣胸懷，創造吸引和集聚國內外優秀年輕人來上海創業，為上海服務的氛圍和環境」（引自熊月之，上海證大研究所主編，2003：121）。又如，陳思和認為新上海人中有大量的外來投資者與白領階層，他們之所以可以提倡新的超越區域性的文化是因為海派的多元與寬容：「一種非常優秀的文化特質（開放特質），它不是立足在一個城市或某個地域，而是與全國甚至世界文化連結在一起的」（上海證大研究所主編，2003：84、88）。

22 「家城」借用李歐梵語(2000: 303)。

喜」。李爽學(2002)評論王文華作品一再強調他的「喻詞妥貼無比，更重要的是富於新意……他用喻之巧，設局之妙，除了王朔，中文世界的痞子文學家看來是無人能及了」。大陸記者陳奕新(2004)說王文華的小說「故事新奇而幽默，語言機智而有深意」。同時，王文華的小說文化翻譯的成功亦歸因於兩岸出版僅需簡繁互換的共同中文介面，因而減少了翻譯所需的時間與成本。中文(Chinese)與華人文化特質(Chineseness)使讀者覺得與王文華筆下的世界並無隔閡，他們因此得以輕易瞭解、認同、挪用王文華創造的都會語言。小說的預設讀者，亦即上海的都市白領也有同感。例如，上海環亞國際貨運公司的姚蔚說：「大家之所以喜歡王文華的《蛋白質女孩》，就是覺得他用充滿感性新奇的字眼和畫面把生活中的一些人物類型化、卡通化，字裡行間自有一種俏皮和狡黠」（吳天克 2003：17）。的確，王文華文字的一個重要特色，即是以俏皮中文對仗與押韻翻譯英文詞語，描述兩性關係。舉例來說，他將“high-maintenance”譯為「高維修女子」。其他像是「淑女殺手」(lady killer)、「L那個字」(the L word)、「感覺有角」(feel horny)、「糖爸爸」(sugar daddy)等等都成功的轉譯移植了西方的都市情愛語言。²³

追求彈性身分的新上海人可輕易在王文華的小說中找到認同的對象。環球華人菁英的形象可被替換成「IF族」、「成功人士」以及「白領麗人」等彈性身分，滿足了全球化時代「新上海人」自我表述的需求。舉例而言，《蛋白質女孩》中，所向披靡的淑女殺手「狼」

23 我認為1990年代已在上海流行的中文版時尚雜誌是王文華能以中文創造全球都會彈性身分的先驅。王的小說有如加長版的中文時尚雜誌，翻譯轉借美國時尚雜誌如 *Cosmopolitan*, *Elle*, *Marie-Claire*, *Vogue* 等談論兩性關係的語言。一如周春玲所言，90年代中國都會時尚雜誌諸如《時尚》、《Elle：世界時裝之苑》、《今日名流》、《精品》等的誕生起源於「新富人」亟需在文化上表述自我。時尚雜誌的定位便是為「成功人士」與「白領麗人」代言。「透過白領，時尚雜誌為新富人製造出一種文化，這種文化以赤裸裸的消費為特色」（1999：139, 143）。而這樣的都市貴族形象成為平民大眾讀者的「想像性滿足」，只要透過購買雜誌或廣告中的名牌商品便同時擁有菁英的身分與榮耀(145)。換句話說，「時尚雜誌規範和提供了新富人的生活方式，並在大眾中塑造出中產崇拜的情緒」（146）。

類男子便是專業經理人的化身。重要的是，這個理想的身分投射暗示了小說中跨國流動的菁英身分是全球華人族群(global Chinese)。這些在台北工作(based in Taipei)的跨國財經人才坐擁都會華麗區的地標建築辦公大樓、出入城內時尚場所、身上展示各色名牌、以世界各大明星城市為家（王文華 2000：10-11）。同時，王文華主角的生活型態亦近似專業經理階級。例如：小說第一集中的第一人稱男主角想像女性友人佳佳去紐約開會，王文華以情書形式再現一個由紐約、股票、斐濟、拖曳傘、手機與傳真等符號堆砌而成的全球羅曼史(global romance)(2000: 237)。²⁴同樣地，《蛋白質女孩2》中寶琳娜為佳佳獻策，要她約男人明天去紐約，也是類似的全球幻想：

找結婚的人很簡單，找能一起去紐約的人卻很難。在像柳橙汁一樣的Upper West Side，只有相愛的人牽手才会有美感……去吃第凡內早餐，去格林威治村看楚浮的《夏日戀情》。（2002：161，粗體為作者所加）

事實上，整本小說中，除了似乎不斷出現的情愛考驗，寶琳娜和佳佳過著逍遙自在、有品味、懂時尚的生活。她們是這麼過日子的：在家用ADSL、上ICQ，開口閉口獵男必殺技；出門在外光鮮亮麗，名牌服裝搭配最新款的Prada或Birkin包；出入Fnac、加州健身房、Room 18、誠品書店與台北大街小巷的餐飲名店。當然，高興的話還可以隨時隨地拎著行李去紐約過節：

上禮拜佳佳到紐約，這禮拜她回台灣過情人節。「怎麼辦，我沒有人共度情人節。」「有什麼關係？」寶琳娜安慰她，「你就一個人過，找個地方吃白肉火鍋。再去買Gucci的新貨，你一樣會感到修成正果」。（2002: 168）

24 敘事者以第二人稱的口吻詳述他的浪漫幻想：

想她在去紐約的飛機上打電話給你，老闆正和你討論思科股票的本益比，她告訴你此刻正飛過你們去過的斐濟，你對老闆說對不起我要接這個手機。想你們在斐濟的阿酷拉小島，兩人各坐著一具拖曳傘飛上天，風把你們越吹越近，近到讓你能迅速親吻她，然後兩支傘纏在一起，你們一起掉進海中餛飩。想起她到紐約後傳真給你一張白紙，右下角寫著蠅頭小字「沒有你的在紐約的我」。你在辦公室回傳給她一張黑紙，上面寫「沒有你的台北的白天」。（2000: 237）

此處我們可特別留意台北在王文華翻譯彈性身分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趣的是：台北的中介功能源自雙城的緊張關係。就文化上而言，上海與台北要比上海與中國之外的其他世界城市更相近。然而，幾十年來台海兩岸的政治情勢致使台北可能對上海而言意味一個最陌生的城市。此種矛盾成了王文華跨國羅曼史最大的商機。一方面，小說中對台北都市文化的再現使上海讀者可以幻想自己擁有相同的社會情境，想像自己以世界為家(at home in the world)，將此時此地與小說中不斷出現的紐約接軌。或者，更準確地說，由於上海與台北都是華人城市，預設的相似性使上海讀者可透過理解「二十一世紀的台北摩登」（借用李爽學語）來想像上海的曼哈頓化，想像新上海人未來的生活方式。²⁵當台北成為上海與其他全球城市（紐約、倫敦）接軌的界面時，文化學習的過程就更趨容易了。²⁶

另一方面，王文華小說中時髦的消費休閒空間對台北中產階級而言或許耳熟能詳，但對眾多上海讀者而言，Fnac、加州健身房或Room 18等地可能都是空洞的符號。而王文華之所以能讓上海讀者完成作者不能完全掌握的都會文化翻譯，也是由於上海台北兩地的實際地理距離無法透過全球化抹除。這些陌生的空間符號為小說的情慾書寫添加幾分異國情調。更重要的是：此種陌生感使不識台北面貌的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自然聚焦主人翁多采多姿的生活方式。讀者得以自行置換上海的流行空間符碼，或者想像跨國彈性身分，生產諸如「上海籍蛋白質女孩」這類的混種身分。換言之，閱讀王文華的台北故事，讀者可以想像同時與多重在地連結（台北—上海—紐約），透過各種形式的商業消費（空間、商品、性愛）來重組、變化身分而不需付出

25 李爽學(2002)指出，「不論是對世事或是對台北未來的走向，他（王文華）的觀察直接而深刻。《蛋白質女孩》非但跨出當下尋常百姓的生活，也在遙瞻未來的世態，想像二十一世紀的台北摩登」。

26 邱立本以「交換文化DNA」來解釋台北中介的位置：「這（台北交雜西方人文空間）當然鉤住大陸小資的時代心情。台北原來並不遙遠，看王文華的小說，就可以從多倫路走到敦化南路，然後大家手牽著手，一塊兒到法國的葡萄園、德國的小鎮、東京的大飯店」（2003: 4）。

任何具體代價。²⁷

《亞洲週刊》曾以「新上海人締造新傳奇」為題將新上海人定義為：「愈來愈多不在上海出生成長、不會說上海話的中國新一代菁英，在上海脫穎而出，在不同領域掌握領導的權力，影響上海的命運」（江迅 2002：26）。王文華將「中國新一代菁英」階級刻畫得「有聲有色」，讓他們的肉慾實驗與奢華風格成為當代傳奇。如此一來，原本對一般大眾而言可能十分抽象的彈性身分（成功人士、新上海人等）不僅有了故事，更成為時尚的情慾主體。當然，如此的文化範型風行上海與上海邁向全球城市的歷史發展密不可分。簡單地說，《蛋白質女孩》系列的走紅是因為找對了時機，找對了城市。小說家在上海渴望成為全球城市之際，將全球菁英的彈性身分想像移植在這片沃土上，為上海讀者開啓了新的認同可能。當小說中描繪的菁英階級與摩登的都會生活成為可知可感的經驗之時，新上海人也就能順理成章視自己為全球都會區域的理想使用者，成功地與世界接軌。

以城市為中心連結的全球資本彈性積累產生的文化邏輯強調跨國主體即是資本家與專業人士。王文華的小說之所以能生產跨國主體的彈性身分，是由於今日全球都會區域連結既成的社會現實與物質條件。嚴格說來，王文華的小說並非僅是描述(describe)都會菁英生活風格，而是將專業人士界定(prescribe)為尊榮體面的跨國代理人與城

27 《亞洲週刊》訪問了一位上海讀者夏雪鎧，這位保險公司業務員對《蛋白質女孩》的觀感就某種程度而言說明了我所謂多重在地連結的彈性身分想像：

雖然《蛋白質女孩》故事的發生地在台北，裡面的人物也稍嫌誇張，但我覺得我的生活中就有「高維修女子」和「蛋白質女孩」，「蒼蠅和鯊魚」類的男子也不少見。看達利、去星巴克喝咖啡、關注美國的金融市場，在網絡上認識不同的女子，並揣摩她們的心思，台北和上海的生活方式原來也有不少共通之處，書中人物看待愛情、兩性關係、交友處世的觀點與方式，雖然我不能完全同意，也不是我本人的生活態度，但這些事每天就在我的身邊發生，每時每刻就在這個城市裡出現，正是這種相同之處，讓我感覺很親切，它會如此風靡上海，可能就是因為這是發生在另一個城市裡的上海故事。（吳天克 2003：17）

市使用者。他的「不著地幻想書寫」(deterritorializing fantasy)將調情式的戲謔和甜美空洞的事物攪拌混合，提煉成消費的文化符號；把摩天樓、五星級飯店以及以各種時髦休閒空間為主的都會華麗區打造成新上海人認同的空間象徵。如此的文化想像隱含著矛盾衝突——城市之間所有的差異，無論是社會、政治、物質或文化各層面，都可能被隱匿消滅。同時，當全球菁英成為城市唯一可見(visible)的使用者，各種資源益形集中，地理發展愈發失衡，其他社會階級及城市現實(urban reality)被邊緣化或視而不見，城市只是資本主義消費空間、全球名牌商品的幻景(phantasmagoria)。

五、「同文同種」的「新上海人」？在滬台灣人彈性身分的協商政治

如前所述，估計有超過50萬台商進駐上海，這些為數可觀的在滬台灣人是否為王文華的蛋白質菁英？還是王愛華的彈性公民？抑或「新上海人」論述召喚的新上海主體？該如何透過跨國都會連結的文化符號來理解移居上海經商、工作與生活的台灣人？相較於小說創造的社會想像，台商陳彬《我的上海經驗》系列中的台商再現，可供我們進一步釐清跨國主體與彈性身分之間協商的複雜可能以及資本邏輯與身分想像之間的緊張關係。²⁸

隨著一波波台潮湧進上海，近年台灣書市出現了各種激增的生存手冊。這些處理「如何生存」(how-to)的實用手冊不僅呈現在上海生活的眾多台灣人對提升競爭力的實際需求，也說明上海提供台灣中產階級跨國遷徙的想像與可能性。其中，陳彬的《我的上海經驗》系列

28 這部分分析的文本出版時間集中在2000年到2004年，文本再現的身分想像的時間脈絡與出版時間若合符節。當然，全球經貿體系下的台北與上海連結是不斷變動的社會實境，但文中的分析重點在於凸顯這段台灣出版界上海熱所代表的文化意義與反射出的社會想像的複雜性。此處的討論或可作為後續相關議題研究的參照。感謝遠流出版社編輯黃訓慶的提問。

最具代表性。陳彬家在台北、1990年代初至上海經商。身為資深的上海台商，陳彬現身說法，以台灣中產階級如何在大陸創業及尋找商機為主，教導台灣人如何移民上海、在上海經商生活、乃至如何了解上海人等等。陳彬的上海實戰手冊系列高居暢銷書排行榜，引起廣大迴響。²⁹

陳彬作品的暢銷就某種程度而言質疑了「同文同種」假設的效用。在台灣「華人共同市場」(Chinese common market)作為連結兩岸的修辭預設即是所謂「一衣帶水、同文同種」。換言之，如果「新上海人」是上海招募全球菁英的論述，是全球資本主義連結運籌帷幄中心與多元地方的文化符號，鼓勵台商登陸追求彈性身分的代表性論述便是所謂的「同文同種」。依照大資本家的說法，兩岸的相似性應能促進彼此互補，達成雙贏。英業達集團溫世仁期許同文同種促成「台灣最強的一代，和大陸最強的一代，一起構成一個更不可思議、更大的兩岸經濟圈」(2003: 170)。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理事長辜濂松(2002)說：「因為中國大陸在語言、文化、距離及勞力土地成本有相對優勢，對台商有很大的吸引力，台商由於語言及文化的比較優勢，加上其靈活性，應該較其他在中國大陸投資的廠商更能取得主導性……」。王永慶身為最具影響力之一的台灣商人，更是積極推動兩岸經濟合作的完全開放，他強調「大陸和台灣是同文同種，講一句徹底一點的，大陸也是我們的，台灣也是他們的……」（林孟儀 2004：111）。³⁰

除了大資本家視同文同種為台商利基，學術界與媒體也不乏類似說法。賀力行與李陳國(2000)指出「基於中國大陸可提供充沛而又廉價之勞動力以降低成本，同時具有地緣及與大陸同文同種的優勢，因此，加速了台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周逸衡與徐明宜(2001)提出建構東京、台北與上海之金三角時援用同樣主張，「未來日商可以藉助

29 《立足上海》曾進入金石堂暢銷書排行榜前三名，《上海商機》則進入金石堂暢銷書排行榜前十名。此外，根據《亞洲週刊》的報導，陳彬在台北炙手可熱，企業必須等待好幾週才能請到他來演講(Cheng 2001)。

30 王永慶曾多次在公開場合反對政府戒急用忍政策（林孟儀 2004：111）。

台商之經驗及其大陸同文同種之優勢，與大陸廠商合作或進入大陸市場」。本地新聞社論也同樣大力支持這樣的論點。例如：《聯合報》2002年社論說「兩岸一衣帶水，同文同種，經濟關係亦絕無可能分割」。（2002年10月18日）《中國時報》2004年的社論則指出：「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後，影響遍及全球，台灣與大陸同文同種，較其他國家，更容易切入大陸市場的利基」。（2004年2月12日）

陳彬認為台灣人在上海成功的秘訣在於改變自身的行為與思考模式，自陳出書是爲了「看台灣人該如何改變舊思維、建立新思考模式」（2001: 9）。有趣的是：若同文同種的論述爲真，兩岸之間只隔了一道台灣海峽，那麼值此華人共同市場發展的大好時機，台商轉換跑道到上海的過程應是輕而易舉，他們何需汲汲營營改變行為思想？如果同文同種已是萬靈丹，該如何解釋陳彬作品的暢銷？爲何眾多台灣讀者仍需要這類生存守則？是否事實證明，同文同種的相似性「利基」既不能提供在滬台灣人既成的文化身分，也不能保證他們能成功搶灘融入當地社會？

陳彬在書中一再指出「同文同種」實是迷思。他認為，與一般認知相反，同文同種對想在上海立足、融入當地社群的台灣人來說，實是阻礙而非助力：「大陸的空間，無法用台灣的感覺去想像」（2000b: 212）。換句話說，即儘管「同文同種、但思想迥異」（2000b: 178）。³¹他提到許多台商都太過自信，相信同文同種能保證良好通暢的溝通管道和人際關係，進而保障生意上的擴展（2000b: 93）。也就是說：同樣的文化背景預設誤導台灣人認為台北與上海的關係就像台北與高雄，容易忽略兩岸自1949年分隔以來，在政治、經濟、社會、價值觀上的巨大差異。

透過第一手的觀察與個人經驗，陳彬試圖說明「同文同種」論述可能的謬誤。然而，他並未提供讀者更深一層的省思。我認為台商所仰賴的同文同種預設真正的問題是全球都會區域跨界合作必然產生的

31 《客居上海：上海生活面面觀》的作者金碧也不斷提醒她的讀者要避免落入「同文同種」的圈套（2001: 220）。

矛盾：「同文同種」論述的本質乃跨國資本家爲了達成資本彈性積累的目的，在區域經濟連結情境下與國家機制協商的語言。不過儘管促成連結的資本流動可能跨界多元，但資本的彈性靈活並不保證都會區域間不同文化身分的彼此認同與對等互重。換言之，所謂流動的背後具有專斷的文化色彩。即使都會連結經濟流動的型態必然呈現多元，但在身分想像上未必有相應的多元身分，其中常以連結網絡中最具有經濟優勢的核心都市的在地性爲文化身分建構的主軸。就陳彬討論的教戰手冊而言，顯然成爲流動階級與彈性公民的定義便是要成爲核心都市的市民（新上海人）。對於跨國主體來說，追求流動或彈性經常要承受與自己在地生長經驗脫離的壓力。這點在《我的上海經驗》系列中也明白可見，陳彬一再提醒讀者，成功的關鍵在於捨棄台灣經驗，按照上海人的方式行事。

那麼，成功在上海闖出名號的台商是否就理所當然成爲新上海人？在《遠見》雜誌的「兩岸研究」專刊中，「新上海人」的確便是在滬台灣人的定義：「上海新經濟的誕生，造就了一群由台商蛻變的新上海人：大資本家、中生代小資、台灣的海歸派，重新在上海相遇」（成章瑜 2003a：101）。然而，在上海證大出版的《新上海人》這本研究上海人新文化身分的論文集，卻不見任何作者將上海的台商定義爲新上海人。同時，陳彬的《我的上海經驗》系列中只見作者耳提面命，教導台灣人如何「在上海行，如上海人」，但終究上海人對台灣人的稱謂並非「新上海人」，除了貶抑的「台巴子」與「呆胞」之外，似乎就是台灣人與台商。³²我們該如何理解如此的矛盾？再者，在已經邁向全球化城市的上海，爲何自台灣赴上海的商人必須在身分想像上汲汲營營讓自己被上海在地所接受？「新上海人」論述不是強調今日上海已承接海派傳統廣納百川，「新上海人」儼然已是世界公民？

32 和在中國其他地區一樣，台灣人在上海的正式稱呼應爲台胞，經商投資者爲台商，台胞後演變爲有貶抑意義的「呆胞」以及「台巴子」，強調易受騙的外地人與鄉巴佬。

至此，「新上海人」論述的矛盾明白可見。冠冕堂皇的「新上海人」大話，在實際運作層面上抽象化(abstract)實際跨國連結資本與人員流動的在地面向、複雜歷史以及跨國主體的差異性。上至連結網絡成員政治關係的變動、跨國公民權的協商、對各國人員資金流動的法令管制與勞資管理方式的調適，下至個人日常生活細節等，都是跨國人員在宏觀與微觀的層次上，必須面對的具體問題。舉例來說，在上海落地工作、生活的台商及其他外地人或外國人，若沒有藍印戶口或務工許可證是什麼樣的身分與處境？³³有哪些權利與義務？他們是否有取得資源和機會的適當管道？換句話說，該如何定義新上海人的經濟權以及一般公民權？同時，如果依黃菊所言，「新上海人是中華人、世界人」，那麼同樣是「中華人」的台商與港澳或矽谷的華人有何差異？與歐美日等外來菁英又如何比較？這些至關重要的問題在「新上海人」論述中找不到答案。

隨著移住上海台灣人的激增，陳彬書中敘述的台灣人圈子出現的彈性身分並非「新上海人」，而是各種以經濟地位以及社會功能界定的身分標籤，諸如「小台商」、「台幹」、「中遊一族」、「台留」、「台勞」，以及描述女性移民的「台媽」、「閒閒美黛子」、「根本美黛子」等等。這些五花八門的稱謂乍聽之下或許只是茶餘飯後閒談使用的語言，也未見於上海與台北連結的官方文化論述，然而這些自我建構的標籤不僅代表在上海居住的台商對自己的認知，也代表他們嘗試協商學習成為跨國菁英身分。更重要的是：這些稱謂呈現了全球都會區域的分工網絡如何形塑跨國主體的文化身分。³⁴

如前所述，薩森對全球城市的討論說明不但資源集中，同時城

33 上海社會科學院熊月之認為可將新上海人理解為「藍印戶口」：1994年浦東地方政府施行藍印戶口制度，好讓「那些之前來到上海的人可成為上海人……換句話說，藍印戶口是地方尺度上的資本移民和技術移民」(2003: 119-120)。但數據顯示在2000年，353萬非永久居留上海的外地人口當中只有3萬人擁有「藍印戶口」的身分。

34 「小台商」、「中遊一族」、「閒閒美黛子」、「根本美黛子」及「台勞」等，請見陳彬(2003: 16-44, 75-80)。關於「台留」，見譚玉芝(2004: 194-203)。

市使用者的文化身分兩極化。光譜的兩端之一是上層的跨國企業專業人士，另一端則為社會底層的新移民、非法移民與從事三D工作（骯髒、危險、困難）的外籍勞工。這兩種階級因此成為最容易辨識的跨國主體位置。全球都會區域兩極的文化身分幫助我們理解：台商這些自我表述的身分標籤為何總暗示非贏即輸。陳彬的說法是在上海當贏者搶回台胞（有美金）的光環、當輸家成為真正的台勞分子(2001: 138)或者砲灰與馬前卒(2003: 182-83)。然而成王敗寇的關鍵是在沒有公民權的保護狀態下，若不能挾資本與專業技術成為新上海人，建立穩固的立足點，便容易在全球都會區域國際分工的階級梯位向下滑落，淪為另一端的底層階級，成為外籍勞工，與台灣的泰勞或菲傭相去不遠。

此時台灣人的身分成為唯一的身分。當失去向上流動的可能，「台」便與跨國分工的底層結合而充滿貶意。由此觀之，「台」這個稱謂實有一體兩面。一方面，在所謂華人同文同種的大旗之下，「台」的意思可能是簡單的來源身分（origin，台灣人），但也可能指涉無法成為跨國菁英（新上海人）的「他者」（otherness）。進一步說，「台勞」、「中遊一族」、「台留」的稱呼都指在大陸經商投資失敗卻仍選擇留在大陸的台商與員工。「台留」是《商業週刊》在2001年創出的詞（陳彬 2003：35），「台勞」有如泰勞、菲傭。陳彬如此半戲謔的描述「台勞候選人」：除了因台灣經濟因素諸如「產業外移、關廠倒閉的失業員工」、「金融不起、股市不振，不得不暫時離開的金融業人員」、「中年失業的行政管理同胞」、景氣不佳「不得不關店收攤的頭家」，還有在上海養尊處優、不知環境變遷、競爭力改變的台灣人：「站幾分鐘就會死的人會成為台勞；沒有敬業精神的人會成為台勞；搖頭族、飆車族會成為台勞；怪東怪西、挑三撿四的人會成為台勞」（2001: 133-38）。

值得注意的是：台商之所以得以輕易生產標籤來描述自我的跨國經驗，是由於既成的資本主義都會連結網絡：混雜的(hybridity)語言

呈現連結的多邊地方性，顯示台灣同時是國際分工人口流動的輸出與輸入端點。³⁵因此，台勞與泰勞及菲傭等稱謂具有共同的語言結構。也就是說，這些身分稱呼不僅顯示他們是全球都會連結國際分工結構生產的底層階級，同時也顯示台灣的國際分工經驗，台灣的外籍勞工（菲傭與泰勞）成為上海台灣人的鏡相。同樣地，「中遊一族」、「中遊員工」與「中遊董事長」的「中遊」兩字及其指涉的雙重意涵源自全球人口流動的社會實境。一方面，「中遊」與台灣中國石油公司的簡稱為同音異字。陳彬指出，前中油董事長陳朝威成為台商自嘲自憐的身分：「台商看到陳朝威先生在中油公司被當棋子要，過得那麼辛苦的痛苦和無奈，而心有同感」，於是在2002年創造出此稱謂（陳彬 2003：35）。同時，「中遊」為中國遊民的簡稱。在這層意義上來說，這個稱謂呼應了「台留／流」一詞，也就是流民(floating migrants)的意思，指向中國近年在全球化的不均衡發展與加劇的階級分化情境下，所面臨的迫切社會問題。

同樣地，「閒閒美黛子」（閒著沒事的有錢女人）和「根本美黛子」（沒錢什麼都不能做的女人）的身分標籤也是國際分工預先決定階級體系的結果。首先，全球都會國際分工預先設定的二元化階級使成功台商，亦即理想全球都會菁英的眷屬身分成為「閒閒美黛子」，也就是到大陸名為出巡實為度假，遊走在台灣、海外與大陸的董太與夫人一族（陳彬 2003：18）。對比「閒閒美黛子」的台商妻子為「根本美黛子」，指她們沒有閒錢：「是『想做』又不知道做什麼，又怕失誤賠光老本，說穿就是『根本沒事可做』，不得不住下來，陪老公、陪女兒，融入當地的生活，和大陸人過相同型態生活的人。」

35 對於台商認同政治的分析可參見耿曙(2002)〈「資訊人」抑或「台灣人」？大上海地區高科技台商的國家認同〉。耿曙在論文中提出五項假設來解釋台商的國家認同，亦即「原始忠誠」(primordial ties)、「教化融合」(state-building agents)、「階級關係」(class relationships)、「全球文化」(global culture)以及「跨國資本主義」(global capitalism)。他將第一波以廣東東莞為主的台商稱為「小頭家世代」，而次一批登陸上海為主的台商則稱為「資訊人世代」。「以東莞台商為典型的『小頭家世代』，仍屬傳統的『地域認同』一類；而大上海地區的『資訊人世代』，則早已超越、拋卻特定的地域認同，邁向新的『全球認同』」。

(陳彬 2003: 19) 再者，此處「美黛子」身分想像與使用混雜語言的關係也是借用台灣文化經驗。不同於「台勞」與「中遊一族」是台商引用台灣類似的階級身分自況境遇，「閒閒美黛子」與「根本美黛子」的身分援引閩南語融合日語，而非用普通話或上海話來創造上海全球都會人員流動的二元身分標籤。此處上海台灣人的文化身分想像凸顯了日文的權威性，台灣的後殖民語境似乎一再援用日文作為表達新情境、新事物的語言。³⁶就某種程度而言，這兩個詞彙也暗示了同文同種的迷思，「美黛子」並非上海人不需翻譯便能立即理解的身分，語言的混雜更記錄身分塑造過程牽涉複雜的社會與歷史情境。

再者，我們不能忽略「美黛子」身分與女性離散經驗的關係。³⁷勞動分工和跨國身分建構之間，不僅因階級制度，也同樣因性別差異而產生複雜的關係。如克立佛(James Clifford)所言，長久以來，我們習慣把離散當成男性經驗：「離散經驗和性別差異密不可分，但其實離散和離散文化的理論有忽略此事實的傾向，理所當然地將旅行和移動經驗視為男性經驗」(1994: 313)。今日全球化國際分工的結果，離鄉已是許多女性的共同經驗，女性移工／移民數量大增。我們如何思考性別分工與國族認同、資本主義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實是重要的課題。陳彬的作品中，「根本美黛子」幾乎已是台灣女人在大陸的專用詞，包括已經定居上海的台商妻子、女性台商、外派女台幹等等。³⁸

36 例如「達人」、「惡搞」(Kuso)與Mazda的「元氣車」等。

37 在此，「離散」的定義並非傳統上代表離鄉背井的意義。如王愛華所言：「離散政治並非描述既存的社會現象，而是描述一個社會類群，這類人之所以出現，是因新跨國主體的形成」(2003: 88)。此處離散一詞的使用主要參考克立佛(James Clifford)與托羅連(Khachig Tölölian)的用法。克立佛主張，「彈性積累需要大量資本和勞力的跨國流動，因而依賴並製造離散人口」(1994: 311)。上海台商即可被視為這類離散人口。若以托羅連的話來說，他們是「跨國時刻的範型社群」之一(cited in Clifford 1994: 303)。此社群產生於現今彈性積累及全球都會區域的跨國時刻。我以台商的例子演示複雜的離散意識如何和多元的移動經驗相呼應，包括錯置(displacement)、同化(assimilation)，或融合(syncrretism)等經驗。分析台商自我言說的標籤，希望能說明「離散主體如何感受全球經驗」(Clifford 1994: 312)。

38 根據《亞洲週刊》報導，「常住上海的台灣女性與常住上海的台灣男性之

雖然「美黛子」包括女性台商與外派女台幹，但此身分指涉的仍以台商妻子為主，她們的身分取決台商丈夫的成功與否。一如「台媽」一語指留在上海照顧小孩的台商太太。上海台灣女性的移民身分再現多為眷屬，暗示了女性以家庭為主的傳統角色，非眷屬的台灣女性在家戶空間之外的不同經驗與身分再現仍不多見。³⁹由此觀之，我們必須重思這些自我書寫的身分標籤預設的「自我」的同質性，並且深入理解身分想像的階級與性別差異。

資本彈性積累帶來的各種人員流動與國際分工生產多重跨國主體，這些主體需要文化再現(articulation and recognition)，而他們身分生產的過程與再現必須置放在全球化都會區域的網絡來理解。我們必須發掘資本彈性積累與彈性身分之間，各種「見」與「不見」(presence and absence)的政治。透過本文，我希望說明雖然晚近全球都會區域已成為常見的現象，然都會連結的文化面向至今仍未被充分討論。都會連結不僅是產生各類跨國身分的社會現實，也成為形塑與言說這些新身分的論述框架，以便再製都會連結網絡。王文華的作品挪用全球都會區域的「訓育守則」，將專業經理階級視為城市的理想使用者和世界主義生活的楷模，《蛋白質女孩》因而成為「新上海人」跨國菁英身分的文化表達(cultural expression)。⁴⁰分析陳彬的實用手冊則可釐清「新上海人」與「同文同種」論述實是東亞都會區域在全球資本主義地理重整與文化符號創造交互作用之下產生的充滿

比例約為三比七，以目前常住上海有30萬台灣人計算，常住上海的台灣女性高達9萬人左右」（紀碩鳴2003：15）。

39 關於移居上海的台灣女性分析可參考紀碩鳴(2003)〈滬上的最新亢奮，告別寶島的憂鬱：九萬台灣女人擁抱上海〉。文中報導女性台商與台幹在上海追求成功的甘苦談而非著眼於台商妻子或台媽的上海經驗。

40 在此「訓育」是英文“pedagogy”。所謂「訓育」意指整合學習方法、目標與內容來傳達知識與價值的技術或實踐方法。此處所謂全球都會區域的訓育可說是資本全球化為求彈性積累重整區域地理，形成地理學家與社會學家所說的網路社會與區域整合經濟體而衍生的各種論述與文化符號。宣揚全球以都會為中心合作連結為大勢之所趨，各地透過都會區域的形成得以與紐約、倫敦與東京此類世界第一階層的全球城市相提並論，也具有類似的全球網絡樞紐功能。

矛盾的身分符號，書中各種台灣人的身分標籤更凸顯彈性身分內在的衝突。都會區域的彈性身分論述彰顯了全球資本主義的地理重整運作的邏輯——一方面隱藏人員流動具體場域的多邊地方性(multiple translocals)、抹除流動主體與連結各端點國家之法律政治社會文化多重協商的複雜性。另一方面，全球都會區域連結投射出的圖像是流動匯集的中心點，例如紐約、倫敦、上海等一級全球城市，而理想的人員流動則是不費吹灰之力出入各國都市華麗區的全球菁英。全球資本主義都會連結而生的跨國主體身分想像所隱含的取捨政治實有賴更多的批判與詮釋來說明。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Castells, Manuel (柯司特) 著，王志弘譯。1989(1993)。〈流動空間中社會意義的重建〉(Conclusi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Meanings in the Space of Flow)，收錄於《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頁367-374。台北：明文。

Lee, Ou-fan (李歐梵) 著，毛尖譯。1999(2000)。《上海摩登：一種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上海證大研究所主編。2003。《新上海人》。香港：三聯書店。

王文華。2000。《蛋白質女孩》。台北：時報文化。

——。2002。《蛋白質女孩2》。台北：時報文化。

王曉明主編。2000。《在新意識形態的籠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學分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汪宏倫。2005。〈奇怪的異鄉人(The Strange Strangers)：「上海台灣人」的社會位置與主體性初探〉，會議論文發表於「去國·汶化·華文祭：2005年華文文化研究會議」，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主辦，2005年1月8日。

- 周春玲。2000。〈時尚雜誌與「大眾文化」〉，收錄於王曉明主編，
《在新意識型態的籠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學分析》，頁
138-153。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金碧。2001。《客居上海：上海生活面面觀》。台北：商訊文化。
- 陳彬。2000a。《我的上海經驗：從旅遊、投資到定居大陸的戰守策
略》。台北：商訊文化。
- 。2000b。《移民上海：我的台灣經驗遇上海派作風》。台北：商訊
文化。
- 。2001。《立足上海》。台北：時報文化。
- 。2003。《立足上海新觀念：根本美黛子與中遊一族的崛起》。台
北：時報文化。
- 黃宗儀。2004。〈都市空間的生產：全球化的上海〉，《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第53期（2004年3月），頁61-83。
- 熊月之、周武主編。2003。《海納百川：上海城市精神研究》。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蕭新煌。1997。〈亞太轉型、區域成長圈與永續發展〉，收錄於中央研
究院編，《東南亞研究論文系列》（*PROSEA Occasional Paper
Series*）No.3，頁1-15。台北：中央研究院。
- 譚玉芝。2004。《台媽在上海》。台北：印刻。

二、英文書目

- Abbas, Ackbar. 2000. "Cosmopolitan De-scriptions: Shanghai and Hong Kong,"
in *Public Culture* 12(3): 769-786.
- Bauman, Zygmunt. 2004. *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 Clifford, James. 1994. "Diaspora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9(3): 302-338.
- Friedmann, John. 2001. "Intercity Networks in a Globalizing Era," in *Global City-
Regions: Trends, Theory, Policy*, edited by A. J. Scott, pp. 119-13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ay, John. 1998. *False Dawn: 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Hall, Sir Peter. 2001. "Global City-Reg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Global City-Regions: Trends, Theory, Policy*, edited by A. J. Scott, pp. 59-7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 Stuart. 2006. "Cosmopolitan Promises, Multicultural Realities," in *Divided Cities: The Oxford Amnesty Lectures 2003*, edited by R. Scholar, pp. 20-5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vey, David. 1990.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Cambridge: Blackwell.
- Holston, James and Appadurai, Arjun. 1996. "Cities and Citizenship," in *Public Culture* 8(2): 187-203.
- Huang, Tsung-yi Michelle. 2005. "Mutual Gazing and Self-Writing: Revisiting the Tale of Hong Kong and Shanghai as Global City-Regions," in *Concentr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31(1): 71-93.
- Kaplan, Caren. 2002. "Transporting the Subject: Technologies of Mobility and Location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in *PMLA* 117(1): 32-42.
- Kim, Samuel. S. 2004. "Regionalization and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i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4: 39-67.
- Ma, Laurence J. C. 2003. "Space, Place,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Space, Place, Mobility, and Identity*, edited by L. J. C. Ma and C. Cartier, pp.1-49.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 Ong, Aihwa. 1999.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 2003. "Cyberpublics and Diaspora Politics among Transnational Chinese," in *Interventions* 5(1): 82-100.
- . 2004. "The Chinese Axis: Zoning Technologies and Variegated Sovereignty," i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4: 69-96.
- Redding, Gordon. 1990.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 Sassen, Saskia. 1998.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Essays on the New Mobility of People and Mone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 2002a. *Global Networks, Linked Cities*. New York: Routledge.

——. 2002b. “The Repositioning of Citizenship: Emergent Subjects and Spaces for Politics,” in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1(46): 4-25.

Scott, Allen J. ed. 2001. *Global City-Regions: Trends, Theory,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Yeung, Yue-man. 2000. *Globalization and Networked Societies: Urban Regional Change in Pacific A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三、新聞報刊資料

2002/10/18。〈三通是超越選舉與換屆的議題〉，《聯合報》，二版社論。

2004/2/12。〈以明確的全球定位建構經濟發展策略〉，《中國時報》，A2社論。

丁文玲。2003/1/5。〈2002華文市場大贏家幾米、王文華通吃兩岸〉，《中國時報》，開卷。

王德威。2002/9/13。〈蛋白質的修辭學〉，《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石磊。2004。〈由暴發到中產：上海的新富階級〉，《開放雜誌》213期，頁40-42。

江迅。2002。〈新上海人締造新傳奇〉，《亞洲週刊》16卷39期，頁26-30。

成章瑜。2003a。〈新上海人〉，《遠見》202期，頁100-113。

——。2003b。〈文化人十里洋場尋舞台〉，《遠見》202期，頁160-163。

吳天克。2003。〈俏皮而狡黠的文字，穿透心理圍牆：台灣的筆鉤了上海魂〉，《亞洲週刊》17卷7期，頁16-17。

李爽學。2002/8/19。〈台北摩登：評王文華著《蛋白質女孩》〉，《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邱立本。2003。〈蛋白質的兩岸關係〉，《亞洲週刊》17卷7期，頁4。

林孟儀。2004。〈王永慶談兩岸、政局與接班：有本事的，台灣人去做總理就好了〉，《商業周刊》841期，頁110-116。

紀碩鳴。2003。〈滬上的最新亢奮，告別寶島的憂鬱：九萬台灣女人擁抱上海〉，《亞洲週刊》17卷4期，頁14-18。

辜濂松。2002/5/7。〈促進產業升級 開創兩岸雙贏〉，《中國時報》，六版台綜經政。

溫世仁。2003。〈從兩岸經濟看台灣未來〉，《遠見》202期，頁166-173。

四、網路資料

anonymous. 2003. "Making Picture Books for Adults," in *Taipei Times*. <http://www.taipetimes.com/News/taiwan/archives/2003/01/10/190417>. (2004/10/21瀏覽)

Cheng, Allen T. 2001. "The United States of China: How Business is Moving Taipei and Beijing Together," in *Asiaweek*. <http://www.Asiaweek.com/asiaweek/magazine/nations/0,8782,165847,00.html>. (2004/10/25瀏覽)

Keane, Michael. 2001. "Cultural Identity,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Regional Diversity." http://www.wacc.org.uk/wacc/publications/media_development/archive/2001_3/cultural_identity_internationalization_and_regional_diversity. (2004/10/25瀏覽)

無作者。2004。〈王文華《蛋白質女孩》中文簡體版：中國大陸一月正式上市，創15萬本高銷售量〉。時報閱讀網，王文華流行館。<http://www.readingtimes.com.tw/authors/tomwang/promote/cn.htm>。(2004/11/13瀏覽)

周逸衡、徐明宜。2001。〈確保台灣廠商在全球高科技產業分工體系中不可或缺：建構以台灣為中心的「矽谷—台北—上海」以及「東京—台北—上海」【雙黃金三角】〉。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網站，國政評論。<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TE/090/TE-C-090-057.htm>。(2004/8/10瀏覽)

耿曙。2002。〈「資訊人」抑或「台灣人」？大上海地區高科技台商的國家認同〉，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網站，國政研究報告。<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IA/091/IA-R-091-061.htm>。(2004/11/13瀏覽)

陳奕新。2004。〈王文華：在大陸出書是我的福份〉，新華網。<http://>

news.xinhuanet.com/book/2004-11/17/content_2227170.htm。
(2004/12/2瀏覽)

賀力行、李陳國。2000。〈台商網絡在大陸競爭優勢之初探〉，《經濟情勢暨評論季刊》第6卷1期。<http://www.moea.gov.tw/~ecobook/season/8906/htm/sag6-1-b2.htm>。(2004/11/12瀏覽)

